

第2卷第4期, 2009年12月

(本期译自 Number 57, Fall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国际高等教育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Vol. 2, No. 4, December, 2009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 对现实的评估.....101

美国学术自由面临的新挑战.....103

十字路口的美国学术自由.....105

国际问题

大学的财政今后会更加独立吗.....107

提高获得率的国际策略.....109

全球化与区域化

博洛尼亚改革的意外影响.....111

巴拿马的全球化、大学和质量保证.....113

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战略.....115

非洲高等教育发展

非洲研究生教育: 危机逼近.....116

布隆迪: 挑战与冲突.....118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

日本高等教育: 招生市场的马太效应.....120

德国: 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122

学术争鸣

回应《进一步探析经合组织的高等教育统计数据》一文.....124

新书简介.....126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办

主编：刘念才
顾问：菲利普·G·阿特巴赫（美）
编辑：吴 燕

刊号：沪（K）第 0621 号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东川路 800 号上海交通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
邮编：200240
电话：021-34205947*13
电邮：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Editor: Nian Cai Liu
Advisor: Philip G. Altbach (USA)
Assistant Editor: Yan Wu

Address: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800, Dongchuan Road
Shanghai, 200240
China
Tel: 86-21-34205947*13
Email: jihe@sjtu.edu.cn
<http://gse.sjtu.edu.cn/kxyj/xskw.htm>

《国际高等教育》简介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中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交流的需求与日俱增。《国际高等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并将努力发挥中外高等教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本刊由两部分组成：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编辑出版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中文版，每年 4 期；由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围绕中国与国外高等教育热点问题编辑出版的专辑，每期一个主题，每年最多出 6 期。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编辑的“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每期包含十余篇有关国际高等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的文章以及新书简介。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编辑的专辑则包含世界一流大学、大学评价与排名、研究生教育、科学英才迁移等热点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论文、研究报告、综述文章、书评以及有关的会议和活动信息。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uoji Gaodeng Jiaoyu) is an online journal with an aim of playing the role of bridge between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ommunities. It consists of 4 issues each year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published by the Boston Colleg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http://www.bc.edu/bc_org/avp/soe/cihe/) in USA and up to 6 issues each year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both Chinese and international interests, such as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university ranking, graduate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of academic talents.

Each issue translated from the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y Boston College contains more than a dozen of short articles covering major aspects and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new publications. Each issue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ains original studies, preliminary reports, review papers, letter to the editor, book reviews, and up-to-date information on activities and opportunities on the selected topics in China and around the world. The issues focusing on selected topics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published online at <http://gse.sjtu.edu.cn/en/>.

学术自由：对现实的评估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altbach@bc.edu

每个人似乎都喜欢学术自由。事实上，如果大学领导或教育部长们被问及该问题，他们都会说这个特权是普遍存在的。然而，学术自由的问题几乎无处不在，主要是因为不断变化的学术现实、政治压力、不断商业化和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以及法律压力。本文旨在说明审慎定义学术自由的必要性，以便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卫学术自由。在互联网和全球知识经济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可能更加明确的定义来理解学术自由。

简要历史回顾

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总是受到大学外部力量的质疑。从马丁·路德的时代开始，教授们就因为自己的观点挑战权威或令人不悦而受到国家、宗教权威或强势群体的迫害。1818年威廉·冯·洪堡在柏林创办研究型大学时，可能是现代学术自由被首次写入法典。德国对于学术自由的想法比较狭窄，只包括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即教师在课堂教学和自己直接从事的专业领域享有自由。在洪堡的思想中，学术自由不包括教师在本专业之外的领域发表言论的自由；德国在十九世纪经常惩罚对政治有异议的学者，排斥社会主义者或其他异己担任学术职务。还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享有学习自由（*Lernfreiheit*），即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学习。

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首次关注学术自由问题，在其声明中强调三大原则：“促进探索并增加人类的知识总量、为学生

提供全面指导、为不同的公共服务部门培养专家”。1940年，经大学校长们同意，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扩大了学术自由的范围，将教师可以在其专业之外的领域发表言论列入其中。换句话说，虽然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的声明强调了教师的职责和一些限制，但教师言论自由的范围变得更加广阔。在德国和美国，学术自由都包括采用终身教职来保护教师的职位，即教师不能因为自己的研究或者对一些话题的观点而被解雇。作为学术共同体的成员，教师受到保护。他们不会因为反对学校领导的学术治理政策而受到惩罚。尽管这一源自德国和美国传统的广义定义可能违背了一些公认的标准，但在那些具有学术自由传统的国家似乎被广泛接受。

当代的困惑

与此同时，学术自由的定义正在扩展，已经超越了普遍认可的标准。有些人现在把学术自由定义为允许有效教学和科研的一切，包括教师参与治理、学术机构经费充足、教与学条件适宜（如教室适宜、能够使用技术设备）等。这种定义把学术自由扩展到包含一所成功大学需要的全部内容。但另一方面，一些国家或大学在声称坚持学术自由的同时，却制订政策限制课堂教学内容或研究和出版物的主题。

当代的现实情况也造成了学术自由问题的复杂性。日益控制知识传播的互联网、远程教育、相关技术创新以及跨国传媒集团的兴起，导致了知识所有权的问题。学术自由问题也被卷入这些技术争论之中。

学术自由是当代高水平“世界一流”大

学的必备条件吗？有证据似乎表明必需学术自由。在各种各样的国际大学排名中，学术自由度高的机构名列前茅。几乎没有排名靠前的大学系统地侵犯学术自由的传统标准。高度的学术自由对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尤为重要，但所有的领域都能从探索的自由和大学对言论自由的承诺中受益。

需要达成新的共识

毫无疑问，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的核心价值。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里，由于大众化、商业化和问责制对高等教育的压力，我们需要对学术自由进行重新思考。我们需要回到由洪堡提出、在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1940年声明中被扩展的学术自由的核心理念。归根结底，学术自由是指教师享有不受其专长领域所限进行教学、研究和发表成果，以及在公开场合（报纸、互联网等）表达意见的权利。学术自由一般通过终身教职、公务员制度或其他方式来保护教师被聘用并尽可能提供最坚实的担保。

美国最高法院1957年在一个非常有名的决议中引述了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发表的一则声明，该声明内容如下：“大学的职责在于营造最有利于思考、实验和创造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应该弥漫着大学的‘四项基本自由’——自主地决定谁来教、教什么、如何教以及招收什么学生。”

这些理念很好地总结了很多有关学术自由的基本观点。学术自由主要关心的不是大学的管理方式，比如资金是否充足，或者如何给付教职工报酬。学术自由不保证教授治校，但应该保证他们可以公开讨论内部管理事务，而不用担心受到制裁。学术自由与问责制无关。大学可以合理地要求教师有一定的产出。教师的工作可以被评估，表现不佳的人可以被惩罚，甚至在极端的情况下被解

雇，但这都必须经过不违反学术自由的严格程序。学术自由保护教师的教学、研究和言论自由，仅此而已。

目前存在的问题

现如今，传统的学术自由在许多地方正受到威胁，我们应当多加注意这些挑战。目前的危机包括教师因为其教学、研究或者言论而容易遭受严厉的制裁，如解雇、监禁甚至暴力。诸如受难学者援救网络（Scholars at Risk Network）之类的团体，为这些学者提供帮助，将其问题公之于众。在一些国家里，研究、教学和出版的内容都受到限制。有时候限制是明显的，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穿越的“红线”是没有明说的。但是，如果学者违了这些条款，就会遭到制裁。

不幸的是，这样的国家和研究领域相当多。在美国这样一个总体上有有效的学术自由保护措施的国家里，问题正在不断出现。最近法院判决，公开反对自己大学的政策并因此受到处罚的学者，不受学术自由的保护。在很多国家，越来越多兼职教师的学术自由得不到有效保护，原因在于他们通常是因为教授一门课程而被聘用，聘用时间较短且期限常常不确定。跨国公司、甚至大学的知识所有权，在一些国家已成为争论的问题。由外部机构通过所有权来控制出版的做法，是否违背了学术自由呢？假如像很多国家那样，政府对课程强加各种要求，是否违背了学术自由呢？总之，学术自由现在正面临相当大的压力，将学术自由这一重要概念的定义扩展到几乎包括所有内容，会使得对学术自由之精髓的保护益加困难。二十一世纪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关注学术自由的核心原则，以便能够在日渐困难的环境中对其进行保护。

美国学术自由面临的新挑战

Robert M. O'Neil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系统前校长，退休时为弗吉尼亚大学法律教授，现负责杰斐逊自由言论保护中心（Thomas Jefferson Cent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Free Expression）和福特基金会艰难对话行动（Difficult Dialogues Initiative）

电子邮箱：rmo@virginia.edu

美国高等教育中学术自由的发展以奇怪的、常常是难以预见的方式在进行。对那些在公立或政府资助高校工作的教师来说，法庭对于学术自由范围的界定发挥着重要作用。独立或私立高校的政策很少受制于法庭的决议，对于在其中工作的教师来说，学术自由的标准由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提供。这两类高校的一部分教师可能还受到劳资协议的保护。美国学者的权利和自由在经过大约十年鲜有危机考验后，学术自由在过去的一两年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其中有三次考验值得特别关注。

柳约翰案

第一个案例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律教授柳约翰（John Yoo）的官司。在担任小布什政府的高级法律顾问期间，柳约翰提供的观点似乎使极端审讯方式被合法化，潜在的包括了酷刑——该方式引起了巨大争议，因此政府立刻宣布放弃使用。当一些包含此类建议的备忘录公诸于世后，立刻出现了要求学校制裁作者的言论，尽管柳约翰具有伯克利的终身教职。当某国家委员会建议取消一些“酷刑备忘录”作者的律师资格、联邦法官拒绝驳回酷刑受害者对柳约翰和其他几位白宫法律顾问的民事损害赔偿时，要求大学制裁的呼声更强烈了。然而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院长拒绝开展任何可能导致解雇的正式调查，坚持柳约翰教授的言论受学术自由的保护，即使其言论与国际法主要原则相悖。但院长并没有否定需要更加严格审判的刑事

罪名的可能，比如战争罪。

尽管普通人很难看明白院长的立场，但这个立场似乎具有无可置辩的正确性。支持美国违反已确立的嫌犯审讯国际准则，这种行为显然是充满争议的，而且与人们对供职于政府的学者的期望相冲突。此外，柳约翰教授可能是因为其学术背景和教师身份而被小布什政府征求意见的。学术自由显然已延伸到了课堂和学术期刊之外，涉及了其他领域和媒体中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如果向政府提供这种危险（甚至违法）的建议可能要面临失去教职的风险，学者们今后可能会让自己的观点无法接受，或直接拒绝被咨询。如果柳约翰教授最终被指控为战争犯并被定罪，可能不会得到多少同情。不过目前来讲，即使是在如此具有争议的案件中，院长对学术自由的保护似乎是符合我们的传统和价值的。

威廉·罗宾逊案

与此同时，一个完全不同但同样具有挑战性的事件在加州大学的另一个校区拉开了帷幕。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社会学教授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向他的本科生班级发送了一封严厉批判以色列在加沙对待巴勒斯坦人方式的电子邮件。尽管罗宾逊自己是犹太人，但他对加沙的情况越来越担忧，在他的邮件中强烈地暗示了以色列现在的行为与纳粹在大屠杀中的暴行相似。在邮件中，他还添加了一些反映中东目前和东欧七十年前儿童尸体的恐怖照片。

罗宾逊的一些学生迅速向一个全国性犹太人组织传达了他们对该信息的深切关注，该组织于是向大学管理人员提出了抗议。教师评议会立即在学校展开了深入调查。罗宾逊的许多同事坚持认为学术自由保护此类交流，而许多外部的和一些内部的团体则认为罗宾逊越界了，滥用了其职位，参与了不可饶恕的反犹太主义。在持续若干星期的指控与反指控后，委员会在初夏宣布结束该事件，并且不再采取进一步措施。大学管理层同意委员会的意见，正式程序就此结束。

教师评议会的处理并没有平息议论，事实上反而引发了一系列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有趣议题。罗宾逊教授使用的新式媒介也依然处于严密监控中。如果他在课堂教学或是通过更传统的方式与学生分享他的看法，这些看法肯定会引起关注，尽管大多数批评者承认授课材料与课程直接相关，因此在教师的学术自由范围内。但是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信息和照片给班上所有学生似乎是完全不同（且应受谴责）的行为。一则，在课堂教学自由的保护范围内，很少明确提及该种交流方式。此外，一些批评者主张罗宾逊利用校园设施（电子邮件系统和服务器）传播了其个人政治观点。二则，随加沙和大屠杀类比一起发送的恐怖照片所产生的必然影响，大大增加了风险。不过，媒介的改变不应减弱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很高兴圣巴巴拉分校也没有这样做），即便是涉及到具有争议性的教师观点。

瓦德·邱吉尔案

最后一个是科罗拉多大学种族研究教授瓦德·邱吉尔（Ward Churchill）的系列事件。尽管教师评议会澄清了他在某网站一篇文章

中关于 911 袭击的论点，即将世贸中心的受害者比作“小艾奇曼”[“little Eichmanns”是指二战期间执行灭种计划的纳粹官员阿道夫·艾奇曼（Adolf Eichmanns）]”，并称赞劫机者拥有“体现信念的勇气”，但丘吉尔最终由于在另一项独立的研究项目中出现的大量严重不当行为，被从终身教职岗位辞退了。丘吉尔向州法院提请了诉讼，要求赔偿非法解雇的损失；陪审团一致认为他被不恰当的解雇，但是仅给予他一美元的象征性损害赔偿。丘吉尔之后再一次提出诉讼，要求恢复其教职。他认为对其研究的调查纯粹是由于“小艾奇曼”一文引起的，并且他认为该调查是违宪的。

2009 年仲夏，科罗拉多州法院的法官驳回了丘吉尔的主张，遵从大学的裁决及学校在最终评定丘吉尔研究方法时采取的程序。学校的裁决尽管不容易被看明白，但似乎是正确的，而且曾被上诉到更高一级的法院。该案的经验教训似乎很清楚：对教授行为完全不同的两方面（研究方法与校外言论），如果仅仅因为前一具有争议性的观点可能引起对后一方面行为的调查而永久禁止调查后一方面的话，那么学校将没有追索权来对付严重但完全独立的违规行为。这样的结果将把学术自由扩展到不适合其保护的范畴。

结束语

上述三个案例都极其复杂，并且非常接近区分学术自由和可罚不当行为的模糊界线。我们对学术自由的理解已经好几年都受到严峻考验了。本文所描述的经验应该可以让我们做好准备，以便更好地面对不可避免的新一轮挑战。

十字路口的美国学术自由

Louis M. Benedict

私立高等教育法律和政策顾问

电子邮箱: lbenedi@aol.com

一直以来,人们都把美国的学术自由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条款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美国最高法院在1967年明确指出,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尽管第一修正案只适用于公立高校,但在几乎所有的美国高校中,都普遍认为学术自由具有保护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在私立大学,受学术自由保护通常在教师的合同和学校的政策中加以说明。

近年来,美国高校出现了学术自由恶化的现象。长期以来作为言论自由价值保护者的美国法院,减少了对公立高校教师一些传统学术自由的保护,致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导致对学术自由保护程度整体下降的因素有若干,这些因素对学术自由今后的生存能力以及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利益构成威胁。

“9/11”事件

“9/11”恐怖袭击事件让人们更多地关注国家安全,也引发了对不同于美国政府官方立场的观点的检查。对于批评美国政府的教师言论,一些群体和国家立法机关要求限制“不爱国的”教师言论(尤其是公立大学的教师),认为纳税人不应该资助“反美”的教师。这些事例对教师言论带来的寒蝉效应(chilling effect),直接影响到了学术自由。在做出批评美国政府的言论或者可能被认为是反对美国而保护其他国家或文化的言论之前,教师们必须考虑到学生、管理人员、立法者和公众可能产生的反应。虽然这种态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平息,但是它对教师言论的干扰削弱了学术自由。

商业模式的(错误)应用

美国的很多高校目前都在尝试运用分层管理这一商业模式。权力和控制现在更加集中,导致教师的自治程度急剧下降,共治校正在消失。学校的行政人员在很少听取教师意见的情况下就做出决策(甚至是有关学术问题的决定),而不是发挥监督和总体协调的作用。公开反对行政机关的教师可能会遭到报复,这些报复行为大多会得到法院的支持。经常处理集权化分层组织的法院在处理学校事务问题时,更多地是听从从大学行政机关的意见,但是在传统的学术自由下,这些事务由行政机关和教师共同决策。

美国法院的判决

尽管美国最高法院声明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特别关注的一个方面,但是它从未准确界定学术自由能够提供什么保护。最高法院把问题留给下级法院,由下级法院决定如何理解第一修正案中的教师言论(学术自由)条款。如此一来,结果多种多样,其中一点就是一些法院非常遵从高校的意见。由于最高法院未在法律上对学术自由做出清晰的界定,教师不愿意冒着花费时间和金钱的风险,来挑战某一高校。

高级法院最近的一个判决加剧了一些法院减少学术自由保护的不确定性。在2006年加塞迪对塞巴罗(Garcetti v. Ceballos)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认为当公职雇员依照公务职责发表言论时,不受第一修正案保护。法官索托(Souter)在他的异议(dissent)里说,他希望“今天的多数观点并不会危及第一修

正案对公立高校中学术自由的保护，这些高校的教师必须“依照公务职责”发表言论”。作为回应，法院的多数观点对此判决是否同样适用于公立大学教师学术研究和教学中的言论这一问题保留意见，所以是否将加塞迪案的决定用于教师言论，将由下级法院来判定。

一些法院已经把加塞迪案的决定应用于高校教师身上了。在2008年兰肯对格雷戈里（*Renken v. Gregory*）的案件中，一名教授提出，由于他批评学校对补助金的处理，学校对其进行报复，减少了他的薪水并且停止发放补助金给他。美国联邦第七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的裁决是，该案中的情况属于教授的工作职责，不是受保护的言论。在2007年

洪对格兰特（*Hong v. Grant*）的案件中，一名教授提出，由于他批评学校的聘用和升职政策，学校拒绝提高其绩效工资。美国加州中心区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 for the Central District of California*）对此的裁决是，该案事关诉讼教授作为教师的工作职责，不是受保护的言论。由于教师的职责通常不仅仅包括教学和研究，这一对“公务职责”的宽泛定义让很多教师的言论无法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因而给学术自由带来了重要影响。

学术自由的恶化并非不可避免，这一趋势是可以扭转的。为了高等教育和社会的利益，最高法院可以恢复传统的学术自由所提供的保护。

大学的财政今后会更加独立吗？

Roger Goodman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高等教育团队/公共财政组副总裁

电子邮箱: roger.goodman@moodys.com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是一家领先的信用评级机构，它对很多机构和证券进行信用和财力分析。穆迪对 500 多所大学和 250 所非营利机构进行信用质量和财力评级。在对公立大学进行分析时，所依据的内容包括大学所在国的结构性政策或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大学的市场地位、管理和治理结构、运营绩效和资产负债能力。

世界一流公立大学并没有立刻感受到经济衰退对其财政的影响，因为强硬的财政政策决议通常需要经过漫长的政府预算过程，才会对大学拨款产生影响。因此，政府的预算过程通常使大学的财政表现成为滞后的经济行为指标。由于政府普遍采取的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常常会延迟或者减缓对大学拨款的削减，影响滞后的情况在当前的经济衰退中更为明显。然而，当消费刺激政策结束，政府开始寻求更好的预算平衡时，很多大学都可能遇到拨款的大幅削减，最好的情况可能就是拨款在更长的一段时间里慢慢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经济萎缩减少了教育之外的其他出路（比如工作），很多人不得不寻求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提高技能、获得证书。这样一来，大学就面临着扩大招生的需求。由于限制招生和学费增加的政策、扩大招生的市场压力以及政府拨款不可能增加等因素，穆迪公司预测，在现有的财政模式下，公立大学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大学的财政模式会改变吗？

对很多国家来说，由于培养熟练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今后十年里，那些能够解决上述互相对抗的财政和政策选择问题的方法，

在公共政策领域将非常有意义。其中一个具有明显经济和政策意义的方法是：大学和政策制定者在现有制度的约束下简单应对，即为改善未来的财政环境应减少招生、延缓招收来自弱势群体的学生、寻求成本效率的提高以及限制资本投资。很明显，在没有额外经费的情况下，大学在提高效率、采用不同的教学模式以增加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方面还有空间。但是在很多国家，今后政府的拨款与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及政策目标之间的差距可能会加大。难以想象诸如扩大网络教育、开发新的教学模式这样的提高效率的措施能彻底缓和高校的资金需求问题。如果某一产业对其他经济部门会产生有利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那么政府限制资本流向该产业的政策就不是最合适的。

另一种方法是使高等教育的资金来源模式转变为基于公共市场的混合式。在绝大部分国家，大多数高校通过提高学费和其他费用来创收的可能性都很大。对那些国家政策已去除学费标准或限制学费水平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这一潜力尤其巨大。在一些国家，我们已经看到了通过改革治理结构、引入非政府的收入来源（如放宽对学费的管制、扩大招收留学生的能力）提高大学独立性的情况。虽然学费收取和管理上的细微变化会引起严重的社会政策后果，但经济资助措施可以确保最弱势的经济群体不受学费增加的影响。

资金筹措和借债能力

大学在资本投资方面也可能会有所发展。随着现有设施的老化以及对顶尖研究设

备需求的增加, 资金筹措将成为大学管理面临的特殊挑战。

在这一次经济衰退之前, 大学资金的来源有: 政府的直接拨款、现金经营收益、慈善和企业的捐赠以及各种借贷。虽然难以准确估计每个国家中各种资金来源的比例, 但对于美国以外的高校来说, 资金主要来自政府拨款, 要么是直接拨款, 要么是大部分的运转收入来自政府。美国的公立和私立高校往往依赖包括政府、私人捐赠、雇主以及资本市场借债在内的多元化资金来源, 来资助新的投资。政府降低借款成本的税收激励政策也鼓励了美国大学大量借债。在穆迪评级的美国公立大学中, 债务和收入之比的中间值是 48%, 大学的未偿债务从 2003 财政年度的 1.01 亿上升至 2007 财政年度的近 1.62 亿。对澳大利亚的大学来说, 债务收入比的中间值只有 7%。

虽然在信用危机之后, 人们对债务和举债经营持很大的怀疑态度, 但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大学来说, 长期的资本资产融资仍然是

明智之举。如果大学管理者在学校资产负债已达到极限的时候追加借债, 将会难以实现并且限制传统的资金来源。然而现在多数大学的债务水平很低, 因此有可能通过借债来资助战略项目。

结束语

大学在国家经济和公共政策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很多大学面临两种互相冲突的压力。一是不断增长的对大学的需求, 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 二是需要适应未来更加恶劣的运营环境以及来自国家这一传统赞助者的资金减少。随着全球对受教育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 大学的招生水平也将普遍提高。尽管政策制定者面临资助能力更加有限的问题, 但他们将继续努力通过扩大入学率和增加研发投入, 来获得有竞争力的社会和经济成果。大学和出资政府之间的关系可能依然牢固, 但有可能会逐渐演变为大学融资渠道更加独立, 包括增加以资本增加为目的的融资。

提高获得率的国际策略

Arthur M. Hauptman 和 Young Kim

Arthur M. Hauptman: 高等教育财政领域的公共政策顾问; 电子邮箱: hauptman_a@yahoo.com

Young Kim: 美国教育理事会政策分析中心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 young.m.kim@gmail.com

过去十年间, 提高高等教育获得率 (attainment rates) ——成年工人中具有高等教育学位的比例——取代提高毛入学率, 成为许多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一重心转移是有益的, 因为它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策正以提高学生的入学率和成功率为主, 而不是只强调更多的入学机会 (一直用毛入学率衡量)。

在美国, 政策上的这些转变带来以下后果: 首先, 人们争论为什么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正在赶上或者超过美国的整体获得率 (尤其在年轻工人获得率方面), 尽管美国花费在高等教育上的 GDP 高于其他任何经合组织成员国。其次, 这样的情况引发人们思考, 其他国家在未提高生均经费和财政投入的情况下, 是如何提高其获得率的?

分类思考

为了回答上述两个问题, “未来的工作”组织 (Jobs for the Future) 最近发表了笔者合作撰写的“成本、投入和获得: 一项国际比较 (Cost, Commitment, and Attainment: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的报告, 该报告是“创造平民化机会 (Making Opportunity Affordable)”项目的部分成果。笔者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在讨论衡量高等教育活动的三个指标时, 对其关键组成进行分类思考的重要性。比如生均成本, 就应该从教学和科研两个领域分别进行考虑 (虽然笔者认为像经合组织那样计算科研领域的生均成本几乎没有意义)。

公共和民间投入也应该分开考虑, 因为那些为高等教育投入大量公共资源的国家几

乎不依靠民间资源。反之亦然, 那些更加依赖民间资源来资助高等教育的国家, 通常投入的公共资源较少。加拿大是这个规律的一大例外。

对于获得率, 我们的报告认为分学士学位和副学士学位 (如协士学位) 两种情况进行考虑非常重要。学士学位获得率名列前茅的国家, 如挪威和美国, 其副学士学位的获得率往往排名靠后或居中。像加拿大和日本这样副学士学位获得率最高的国家, 其学士学位获得率不一定最高。因此, 越来越多笼统引用获得率排名的报告应该阐明这一区别。

国际策略

报告中指出的另一个经验教训是: 最有意义的国际比较是认真研究各个国家实现高获得率的策略, 而不是关注统计数据的排行。因此, 我们审视经合组织统计数据时, 研究的是某些国家获得率迅速提高的原因。报告总结了以下八种有助于不同国家持续提高获得率的策略。

提高学位完成率。一个显而易见提高获得率的办法是出台法规或提供激励, 让高校和学生提高学位完成率。一些国家在这个方面已经获得较大进步。例如, 丹麦目前在拨款方案中采用毕业率这一指标。至少有一小部分的经合组织成员国提高了人口中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比例, 如澳大利亚、冰岛和意大利。比起竭力拉伸高等教育系统应变能力的大幅度扩招, 不断提高学位完成率更像是可持续提高获得率的方法。

缩短培养时间。欧洲国家正在通过博洛

尼亚进程寻找提高其高等教育系统效率和效能的各种方法。其中一个关键就是缩短学士学位的常规培养时间，即从多数欧洲国家的五年（或者更长）时间缩短为三或四年。一些欧洲及欧洲之外的国家已经采用了这种方法，如澳大利亚、捷克、冰岛、日本、新西兰、瑞典和英国。博洛尼亚进程还激励一些国家开展有助于缩短平均培养时间的改革。

扩展副学士学位教育的规模。许多国家以相对较少的成本和投入刺激获得率增长的一个主要方法就是加大对副学士学位教育的投资，其生均成本往往低于大部分学士学位教育。加拿大和日本都采用这一策略来提高其整体的高等教育获得率。

加大公共投入（public commitment）。向高等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经常可以提高毛入学率，从而转化为更高的获得率。一些国家（尤其是北欧国家）已经投入了大量的公共投入来扩展高等教育系统、提高获得率。爱尔兰也显著提高了投入高等教育的公共资源，但这一提高来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不是公共投入的大幅增加。

依靠私立高等教育促进增长。韩国和日本是典型的依靠私立高等教育提高毛入学率和获得率的工业化国家。两国都是在生均成本和公共投入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现了获得率世界领先。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利用这种策略来扩大其高等教育系统的规模，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扩大大学的招生规模。目前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学士学位获得率已经接近或超过美国，起码在最年轻的工人中是这种情况。学士学位获得率最高的挪威聚焦于学士的培养，其副学士学位教育的规模则很小。如此一来，这些国家的生均教育成本和公共投入往往都相对较高。他们的生均研究成本也高

于那些大学较少的国家。

提高公立高校的学费。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已经通过更多地依靠公立高校学生的学费提高了毛入学率，进而提高了获得率。加拿大采用了这种策略，现已成为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整体获得率最高的国家，但大量的增长都来自副学士学位获得率的提高。在美国和新西兰，更高的学费也扩大了资源，因此使得招生规模得以扩大。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典型代表，通过其高等成本分担计划（Higher Education Contribution Scheme），先由国家支付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学生毕业后根据自己的收入水平进行偿还。最近英国和泰国也采用了类似的措施。

海外招生。许多国家增加资源、扩大招生的另一个办法是招收更多的留学生。这些学生支付的费用通常接近市场水平，能够为高等教育提供重要的资源。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这个方面特别积极：其留学生的比例为1/5或更高。在奥地利、瑞士和英国，留学生至少占在校生总数的1/10。但是由于这些学生不是学习所在国的公民，蜂拥而至的留学生对获得率的影响可能不大。

结束语

当世界各国政府在经济严重衰退时期处理经济问题时，上述八个策略都值得考虑。由于萧条期后的经济复苏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更亟需政治家和教育领导者们关注那些能够以经济可持续的方式提高高等教育学位获得率的高等教育策略。

作者注：报告全文请参见：
http://www.jff.org/Documents/MOA_report_051909.pdf.

博洛尼亚改革的意外影响

Sybille Reichert

瑞士苏黎世赖克特高等教育政策和战略开发咨询公司 (Reichert Consulting: Policy and Strategy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 总裁

电子邮箱: sybille@reichertconsulting.ch

10年前博洛尼亚宣言签署时,29位部长所做的协同改革各国高等教育系统、创建通用易读学位结构的承诺最初并未被认真对待。很多利益相关者将这些目标视为欧洲部长级会议司空见惯的夸张辞令。不过在如今临近2010年这一博洛尼亚进程自我设定的最后期限之时,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部长级同侪压力下,大多数改革目标似乎实现了,尽管在大多数国家只是形式和表面上的。

博洛尼亚改革希望提高欧洲高等教育质量和国际吸引力的设想仍停留在愿景状态,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投资,而做好准备的国家则寥寥无几。博洛尼亚改革的预期成果包括: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灵活的课程和学习方式、学习成果的清晰描述(以利于学生流动和对校际之间学习期限的认可)、适应更多样化学生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等教育。实现这些目标需要更合理的生师比和教师培训,但大多数国家都不能提供。

在这个当口,我们应该不仅仅看到不足(可能有助于引发进一步的改革),还应审视一些不期而至或未被注意的博洛尼亚改革的影响,这些可能已经以一种预言家所未见的方式深深地改变了高等教育。

系统层面的影响

在众多博洛尼亚改革进程的意外影响中,有四个方面引起了高等教育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兴趣。

渗透。博洛尼亚进程创建了一个如此密集的政策交流和高校对比网络,以至于各个层面的政策选择都有可能更加迅速地出现在

其他欧洲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国家间政策讨论的扩散已经达到了无法预料的强度,使得欧洲高等教育的图景开始呈现为一个共同的“欧洲高等教育区”。博洛尼亚为处在相似转型中的欧洲各国带来了经常性的跨国交流和政策咨询。比如,斯洛伐克设计的研究评估源于英国科研水平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的部分内容;法国仿效德国的卓越计划,对通过竞争遴选出的10所优质大学给予基础设施支持;许多国家合并高校的动机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实践。

催化剂。博洛尼亚进程对紧迫性和国际竞争力的描述、其课程和质量目标的深远影响也促进了其他“紧迫的”国家改革。许多国家改革议程已超出博洛尼亚进程的“行动路线”且进展顺利,成为一个日益国际化的高等教育区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通常包括增加院校的自治权、采用新的治理结构使学校具有更强的领导力、利益相关者具有更多的影响力以及提高绩效型资助的比例。这样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奥地利、荷兰、丹麦、挪威、一些德语系国家、比利时的法兰德斯地区、葡萄牙、斯洛伐克及最近的西班牙。欧盟委员会最近资助的一项关于欧洲治理的研究记录了这些趋同情况。

职业化倾向。博洛尼亚改革强调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以及新的学士学位与劳动力市场的联系,因此加强了职业型高校在许多欧洲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地位,比如挪威、德国、荷兰和瑞士常见的应用技术大学(Fachhochschulen)。与里斯本议程(Lisbon agenda)对创新的强调加在一起,大学非传

统职能的地位上升到了公众认可的层面。虽然研究型大学的地位通过国际排名得到提升,并成为国际化高等教育体系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但基础研究和传统学术研究培训的弱化所产生的总体影响依然值得关注。博士教育被认为在非学术雇佣领域也具有效用和实用性,由此带来对可迁移性(transferable)研究技能培训的关注。这被认为是博洛尼亚改革的间接影响,在德国、瑞士、挪威、芬兰、比利时和法国都能见到。

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最近关于博洛尼亚改革实践的研究表明,新的两级课程经常被设计成本科阶段更加面向大众教育,硕士阶段更加面向精英教育。根据欧洲大学协会(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的趋势研究报告,虽然很多高等教育系统仍将硕士作为主要的大学学位,但前三年教育的本质已经在新的本科教育中发生改变。根据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ague of European Research Universities)的报告,教师密集的科研训练大多被限制在硕士生培养阶段,尽管一些研究型大学试图逆转这种趋势。在高中毕业生都有机会接受本科教育、而硕士教育可以挑选合适学生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发现高等教育系统大众和精英分层的早期信号。一些资源较少的高等教育系统(如匈牙利、斯洛伐克和捷克)已经只允许最为优秀的学生继续攻读硕士学位。总的来说,成本压力和劳动力市场对新学位的反应可能会决定学士学位是否能成为某些领域的主要学位。

高校层面的影响

中央领导权。博洛尼亚改革有助于加强

学校的领导地位,创建一个全校范围的咨询和决策制定流程。由于博洛尼亚改革在那些高校中央领导权被强化的国家与高校的治理联系在一起,导致一些地方(如法国和西班牙)的学生和学者产生了争议。

打破界限(Crosscutting)。欧洲大陆的许多大学都有割裂学校的垂直分界线,博洛尼亚改革也试图消除这些垂直分界线,鼓励开展跨学科的教育项目和科学研究。特别是新的硕士教育项目,在努力追求这样的新方式并建制化。另一个趋势是支持高校内部或校际之间建立新的跨学科中心或博士生培养学院,尤其是在德国、法国、瑞士、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利益相关者。最终,与博洛尼亚改革议程联系在一起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不仅仅通过普遍的新治理结构被强化了,比如学校董事会(如奥地利、丹麦、挪威和荷兰)和专业咨询委员会。最近的研究显示,虽然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直接影响在大多数传统高校仍受到怀疑,但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专业咨询则为所有类型高校中的学者们广泛接受。

结束语

谈论欧洲一体化的愿景在未来十年是否会实现还为时尚早。在一体化的欧洲中,有相当比例的学生和毕业生由于其先前有助于出国的学习经历和资格完全被认可而出国留学或工作。然而,除了希望实现博洛尼亚改革的远大愿景和巨大潜力之外,我们或许应该开始更认真地关注那些不期而至的影响。

巴拿马的全球化、大学和质量保证

Nanette Svenson

在巴拿马共和国巴拿马城的高等教育咨询顾问

电子邮箱: nanette.svenson@gmail.com

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在过去二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原因是日益加深的全球化。然而,是国际和本土力量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最具影响的力量来自两个方面:经济和政治。经济因素推动商业机遇与高等教育结合;政治因素推动国家通过政策法规确立高等教育的愿景。这两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以及产生何种高等教育系统,主要取决于所实施的质量保证机制。

巴拿马共和国是典型的高度全球化的小国,其大学系统自1990年起开始呈指数型扩大,但没有坚实的质量保证体系。来自国家科学、技术与创新秘书处(National Secretariat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的最新研究展示了质量保证的缺乏如何使大学教育产业侵蚀政治愿景,并进一步揭示了这种情况如何妨害竞争力。研究这一特殊但相当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可以为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有着类似情况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教训。

巴拿马的大学

巴拿马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只有2所大学。如今,教育部共认可36所大学,公共档案在册的大学超过95所。这对于一个人口300万、潜在大学生源少于30万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在高校数量增加的同时,高等教育趋同的全球趋势推动了专业和标准协调化(harmonization)的行动,反过来又影响了巴拿马的监管环境。

除少数学院运营了十年或更短时间外,大多数大学都是在过去15年中建立的。其中

私立大学占多数,且几乎全都是合法注册的营利性机构。公立大学共5所,其在校生数几乎占全国的75%。最古老、最大的是巴拿马大学;其他大学都是近来出现的,主要源自前巴拿马大学的院系或区域中心。

虽然私立高等教育的在校生规模刚刚超过全国的1/4,但其增长是最快的,包括了所有公共档案在册的大学和36所教育部认可的大学中的31所。私立高校极少是非营利的。很多私立高校是与国际供应商合作的结果,这些国际供应商创建分校、在线远程学习项目、“离岸”学位、特许合约或跨国公司。

进入巴拿马市场的国际高校包括: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陶森大学(Towson university)、马里兰圣母学院(College of Notre Dame of Maryland)、佛罗里达国际大学(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哥伦比亚圣马丁大学(Universidad de San Martin of Colombia)、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圣路易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 Louis)、国际培训学校(School of International Training)和亚丁商学院(ADEN Business School)。其中只有佛罗里达州立大学能说自己具有全分支校、相当的市场份额和数以千计的毕业生。其他高校通常是特许某些特定学位或课程,有一些只开设针对外国学生的海外教育项目。因此虽然国际大学越来越多,但除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外,国际大学的综合影响力相对较弱。

进入巴拿马的跨国营利性大学公司包括罗瑞特国际大学集团(Laureate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和惠特尼国际大学系统(Whitne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ystem)。这些公司拥有多所学校, 开设面向低收入人群的教育项目, 吸引了更大批的学生。

在合法注册的私立大学中, 有几十所没有可用的联系信息和基本信息; 更多的大学可被看作是“车库型大学”(garage universities), 公寓或办公室前的牌子常常来去一样快。这两个现象都引起了对学位工厂和欺诈行为的担忧。因为巴拿马没有认证系统, 皮包学校易于运行乃至繁荣。

商机与愿景

像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 巴拿马签发了大量反映其高等教育全球化和愿景的法规和合约, 以推动其大学达到国际标准。最重要的计划有: 1998年建立巴拿马“知识之城”的法律, 打算在前美国军事基地一起引进国际商业、技术和学术圈; 2003年签订的协议建立了中美洲大学认证委员会(Central American University Accreditation Council); 2006年颁布的法律创建了巴拿马大学教育评估和认证国家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for the Evaluation and Accredita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然而这些具有远见的行动要与根深蒂固的旧法规进行竞争: 1927年促进公司创建的法律允许巴拿马人和外国人快速、简单、便宜地建立任何不违法的企业, 包括高等教育方面的; 1972年的宪法条款对巴拿马大学(这所学校说好听点儿是机能失常, 说难听点儿则是公然腐败) 实行集权控制和私人监督。前一条文促成了大学丛生, 因为获得教育部

认可并不难, 但当局制止未获认可者则很复杂。后一条文为巴拿马大学带来了生意, 阻碍了自治的质量保证实体的建立; 巴拿马大学教育评估和认证国家委员会在发起三年后依然没有运营。

大量的低薪兼职教授、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以及有限的职业选择, 这些非法规因素进一步促使高等教育成为诱人的产业, 并且也鼓励大学销售如英语、办公室礼仪和计算机技能等营利的通用技能, 与学位课程一起销售。

启示

在巴拿马, 普遍认为大学教育的大部分内容和实用性不符合国际标准或市场需求, 这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常见问题。但是若没有一个公私立高等教育都支持且独立运作的质量保证实体, 经济全球化将支配政治, 商业将侵蚀愿景。结果就是尽管可能有更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 但本土学位的价值不再。这已经在巴拿马发生了。最近一份国家研究报告指出, 80%的中高层管理持有国外大学学位。

没有可信赖的质量保证, 发展中国家的大学系统将失去有效推动国家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地位。这将增加对他国教育和劳动力的依赖度, 特别是在巴拿马这样的国际服务主导经济的国家。质量保证是大学实力提高的第一步。但要采取这一措施, 国家必须摒弃大学发展是商机的心态, 认识到大学的发展是战略必需。

加拿大大学的国际化战略

Sally-Ann Burnett 和 Jeroen Huisman

Sally-Ann Burnett: 高等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 contact@saburnett.com

Jeroen Huisman: 英国巴斯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管理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 j.huisman@bath.ac.uk

对于那些接受全球化并吸引了大量留学生或开创了全球研究网络的大学, 媒体和学术领域都颇为关注。当然人们也注意到一些失败之举, 比如某大学在开办一所海外分校几个月后便将其撤销。可能是受地理位置、使命面向本地区/区域、缺乏声望和地位所限, “普通”高校面对全球化时采取的拓宽其国际化的战略很少被关注。此外, 另一个被现有文献忽略的题是: 高校的文化与国际化策略和活动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希望通过研究加拿大安大略省4所具有可比性的大学, 来填补这一空缺。这4所大学主要是本科院校, 规模相对较小, 其中3所的学生人数不到8,000, 另外一所学校的学生人数约为17,000。我们分析了来自政府和这些高校的背景资料, 进行了实地调研, 并且采访了在国际领域工作的资深教师和工作人员。

安大略省是世界上最具有多元文化的地方之一, 这促进了当地高校积极开展国际化活动。这些高校相对自主, 具有自我制定使命和战略的自由。由于政府对国际化项目的态度并不明朗, 所以在如何推进国际化方面这些高校几乎接受不到指导。此外, 由于省政府和联邦对高等教育不同方面(有时是重叠的)的双重管理, 使上述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国家层面缺乏明确的战略, 未向学生和高校提供经济激励, 因此到国外学习的大学生不足1%。加拿大高等院校协会(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f Canada)最近一直在宣传加拿大的高等教育, 但是一些高校仍然“遭受着”缺乏国际吸引力的困扰。

对全球化的反应

被研究的大学之间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关注国际招生, 尽管其结果存在较

大差异: 留学生的比例在1.2%~8.5%之间变化, 学生的主要来源国家也有很大差别。四校的侧重各有不同: 有的强调学生的流动性, 有的强调教师的流动性; 有的强调课程的国际化, 有的强调国际合作研究。国际化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国际招生的原因, 主要是学生多样化的价值以及增加收入。

我们发现, 高校的文化影响其对全球化的反应。在这4所大学中, 有两所正孕育创业文化的大学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制定了最系统、最广泛的战略。其中一所大学也具有官僚文化, 但这并未限制其制定有效的应对策略。另一所有着学院和独裁特征的大学和一所有着学院和创业特征的大学采用的策略更为边缘化。

结束语

我们的研究支持了创业文化和应对全球化挑战所采取的策略类型有关系的看法, 但需要记住的是, 其证据仅局限于被研究的4所大学。然而, 制定全面且适宜的全球化应对策略不仅仅是改变文化的问题。有关组织文化的研究表明, 改变不可能在一蹴而就, 诸如政府政策之类的环境因素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 文化和战略可能会相互促进: 课程国际化、学生多元化等方面的进展可能会增强创业精神或有助于创业文化在整个大学里传播。鉴于这4所大学都希望扩展它们的国际化程度, 我们为每所大学都建议了具体活动和战略。这些建议包括更加明确愿景和使命、制定恰当的预算分配、把国际化放在组织结构的某一特定位置(抽象的或具体的)、同加拿大和国外兄弟院校建立战略同盟等。

非洲研究生教育：危机逼近

Wisdom J. Tettey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University of Calgary) 传播与文化学院教授

电子邮箱: tettey@ucalgary.ca

教师短缺已成为非洲各大学面临的巨大挑战，而且短期内看似不会缓解。事实上，非洲高等教育图景的观察家们一致将此问题看成非洲各大学完成其使命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他们认为，如果不尽快采取紧急协同行动来解决这一问题，非洲学术界不但会失去培养必需数量人才的能力以支撑国家对人力资源的需求，而且其学术生活的质量也将继续恶化。上述担忧要求评估非洲大学培养下一代学者以战胜衰退，并由此提高教师能力和复兴学术生活的能力。这些努力的关键是研究生教育，这也是本研究的焦点。研究的样本包括非洲高等教育伙伴关系（参见 <http://foundation-partnership.org/>）的15所大学和7个国家。

研究生规模

有些高校的研究生数量和比例似乎正在提高。在伊巴丹大学 (University of Ibadan)，研究生的比例从2001年占学生总人数的18%上升到2006年的35%。不过，其他一些高校出现了下降趋势。比如加纳大学 (University of Ghana)，其研究生比例从2000年的14%下降到2008年的7%。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的研究生比例从2000年的32%降到2007年的26%。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 (Makerere University) 的研究生比例在2006~2007年从7%下降到5%。2008年，莫桑比克天主教大学 (Catholic University of Mozambique) 的学生中仅有3%为研究生。总体来讲，非洲所有国家的研究生比例都相对较低，南非为15%、尼日利亚为7%、加纳为4%。

性别分布

在研究生性别方面，除南非各大学的研究接近性别平衡外，其他非洲国家的情况都是男性占主导地位。在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女性研究生的比例在2000~2005年间从54%下降到50%，而达累斯萨拉姆大学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 的这一比例在2002~2007年间从35%下降到27%。不过这种趋势有望改变，开始回升而不是继续下降。在加纳大学，女性研究生的比例从2000年的25%增长到了2008年的33%。

硕博士比例和专业分布

研究生的硕博士比例和专业分布情况让人担忧。2008年，加纳大学的博士生仅占研究生总数的6%，较2000年5%略有上升。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这一比例从2000年的7%上升到2005年的10%。在南非，研究生中的博士生比例2000~2006年间停滞在1%。虽然硕士生的数量逐年增加，但下一代学者的后备军（也就是硕博生）的比例依然非常小。

非洲大陆现有的研究生规模让我们对非洲高校培养足够数量未来学者的潜力有了更为清醒的预测。大部分研究生学习的都是那些有可能为他们带来学术圈之外职业发展机会的专业。在过去十年，像MBA这样的职业型管理专业已经过热。

毕业率、保持率和完成率

相比硕士毕业生获得硕士学位的情况，博士毕业生获得学位的比例相当低。2006年，

加纳大学只有11名研究生获得博士学位,仅占研究生总数的2%;2006年,纳尔逊·曼德拉城市大学(Nelson Mandela Metropolitan University)仅有6%和1%的研究生分别获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同年,斯坦陵布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相应的比例为14%和2%。硕士和博士毕业生性别分布不平衡的情况司空见惯。2006年,伊巴丹大学的182位博士毕业生中,仅30%为女性;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授予的研究生学位中,仅34%为女性获得。

虽然研究生规模是决定未来学者储备力量的一个有效指标,但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完成学业的学生比例。对于任何旨在增加未来学者数量的战略规划,完成率的数据都是必要且重要的,南非夸祖鲁纳塔尔大学的情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该大学的健康科学学院,2000~2006年间学术型硕士生的平均退学率约为56%,而博士生的相应数据为35%。一半以上的硕士生和超过1/3的博士生退学,将对下一代学者的培养造成负面影响。完成率相关指标的统计数据则更加令

人忧心。2000~2006年间,学术型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完成率分别平均为11%和10%。仅一成的学生毕业,显然表明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严重脱节,这对培养必要数量和教育水平适宜的学术人员补充学术领域造成了严重影响。

结束语

没有充满活力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和可行的学术生涯支持战略,培育下一代学者几无可能。为了重振学术界,非洲高校不仅必须提高入学研究生的数量、比例、分布和质量,还要保证这些特点反映在研究生输出上。研究生规模小、毕业率和完成率低、一些专业退学率高,对培养足够的未来学者并非吉兆。有鉴于此,需要设计并实施具有创新性且互补的拨款模式、前瞻性的课程以及增加未来学者的战略。比如,改善学术圈女性比例低的情况,必须从提高研究生中的女性数量开始。高校对研究生学习生活环境和职业发展的敏感和响应,尤为有助于吸引并留住非洲下一代的学者。

布隆迪：挑战与冲突

Dorothy E. Finnegan

美国威廉玛丽学院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教育系高等教育专业副教授

电子邮箱: definn@wm.edu

布隆迪是非洲中东部的一个国家，人口近 900 万，面积与美国马萨诸塞州相当。该国地处东非大裂谷 (Great Rift Valley)，北接卢旺达，濒临坦噶尼喀湖 (Lake Tanganyika)，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人均年收入为 138 美元，一半以上的国家预算来自外部赠与和发达国家与国际基金的贷款。

尽管布隆迪于 1961 年脱离比利时取得独立，但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殖民时期激化的宗教冲突阻碍了国家的发展。和邻国卢旺达一样，布隆迪刚刚经历了两大种族——胡图族 (85%) 和图西族 (14%) 之间长达 12 年的内战。从历史上看，图西族在社会中占据上风，但 2005 年采用的新宪法确保了更为公正合理的政治代表制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2006 年，胡图族叛军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冲突仍然主导着这个双语国家，基隆迪语 (Kirundi) 和法语。

教育状况

布隆迪的教育系统不仅反映了其殖民历史和饱受战火摧残的过去，而且也反映了其不稳定和贫困的国家财政状况。在布隆迪，约有 60% 的人口受过教育。政府为 7~12 岁的儿童提供非强制小学教育，但只有 36% 的儿童完成了小学教育。中等教育的入学率维持在 14% 左右，大部分的高中集中在首都布琼布拉 (Bujumbura)。国家财政的 18% 用于教育，其中一半用于中等和高等教育。

布隆迪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非常低，只有 1% 的 18~22 岁人口进入 4 所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位于布琼布拉的国立布隆迪大学 (University of Burundi)，其在校生规模约为

4,000 名学生。其他 3 所私立大学建于过去十年间，都与宗教组织有关。其中 2 所位于布琼布拉，分别为布琼布拉日光大学 (Université Lumière de Bujumbura) 和希望大学 (Université d'Espoir)，其在校生规模都在 2,000 人左右。另外一所恩戈奇大学 (Université de Ngozi) 坐落在三小时之外的一个乡镇。位于布琼布拉的还有一所技术学院和一所高等师范学院。

学术生活

国家持续的种族冲突和贫穷的财政状况，不仅给公立大学的资源带来了负面影响，也困扰着新建的私立高校。政府的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按照级别排序的教师工资。因此，有限的资金支出导致教学环境艰苦、图书资料匮乏以及教育技术几乎全无。匮乏的互联网资源和电子邮件系统，迫使教师和学生不得不使用雅虎和谷歌的电子邮件系统。尽管教师可以在校内检索一些在线资源，但学生必须去网吧使用互联网。

由于布隆迪不提供高级学位，学生必须去欧洲或美国攻读并获得博士学位。布琼布拉大学和比利时的几所大学之间设有博士生的合作培养。然而，为了回避移民问题，比利时的大学已经制定了新的政策。该政策被称作“三明治体制”，博士生在比利时学习三个月，搜集学术信息，之后必须返回布琼布拉。由于布琼布拉的图书和网络资源有限，非常不利于学生的论文研究。

布隆迪的大学采用比利时传统的教师等级：讲师、副教授和正教授。由于资源不足，很少有讲师从事科研，所以都处于较低的等

级。由于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致使教师们

在多所高校上课、从事咨询。除了人才外流，大学里有限的学术资源导致了笔者所称的“爱国者惩罚”(patriot penalty)：很多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甚至完全不能在专业层面继续他们的事业。有一小部分教师在学术上比较活跃，有一些生物化学或者法律专业的教师研究国内问题。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官的一位布隆迪大学(所以该大学有外部资金)的教授，正在开展首例全国性研究。由于现代化造成传统价值观的瓦解，对妇女的性暴力有所增加，该教授的大规模研究就是为了记录并研究这个日益严重的问题。布琼布拉的布隆迪大学和两所私立大学的一些教师认为，教师的身价正在日渐下跌。

有限的图书资源和匮乏的互联网联接，使学生无法接受先进的教育。专家认为，即使在第二级教育中，学生也经常被迫运用基本的认知技能。布隆迪高校的课程体系沿用的是《博洛尼亚宣言》之前欧洲大学传统的学位结构和学科领域，但强调的内容和认知过程却不一定相同。布隆迪大学正在商讨用学士和硕士结构来取代第一级和第二级教育，但教师们似乎反对这一努力。私立学校没有受到殖民传统的影响，为学生提供非传统的职业教育，也因此成为一种选择。遗憾的是，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五花八门。来自弱势种族的学生担心自己虽然接受了教育，但毕业后不一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尽管实施了新的宪法，但布隆迪仍然存在种族偏袒。

希望的曙光

由于布隆迪教育系统自身的原因，其内部正在逐渐出现亮光。首先，大学(尤其是

私立高校)正在积极地与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的各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布琼布拉日光大学的校长已与非洲以外的6所高校签订了协议。其中与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合作，拓宽了商学的课程。其他合作协议的收效甚微，但该校长在继续寻找大量其他途径来帮助自己的学校。恩戈奇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西班牙的一所技术学院已经派出一支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队伍，带着必需的设备，到这所偏远的大学安装互联网，并且对恩戈奇大学的学生和人员进行设备维修方面的培训。因此，布隆迪的一所高校正在获得访问更广阔外部天地的稳定途径。

布琼布拉日光大学一名处于第一级教育阶段的学生(相当于大一学生)在布琼布拉以外的一个村庄建立了一个基层组织。这个由精力充沛的年轻大学生、新毕业生和一名指导教师组成的团队，为村民讲授健康和营养知识，提供有关艾滋病的咨询和检验，并且打算建立一所中等学校来进行技术教育。他们已从美国大学收集到了一大批书籍，目前正在积极寻找资金把这批书从美国运到布琼布拉。

种族战争及随之而来持续的紧张局势和政权斗争，与政府缺乏远见合在一起，阻碍了布隆迪在独立后获得显著进步。尽管大学的资源短缺，但管理者正在积极寻找使其设施和课程现代化的援助。随着两个种族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提高，越来越有可能出现解决国家现有问题、达到社会和谐的新方法。种族间的和解可能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来自政治领导或者几十个主要关注救济的非政府外部组织。

日本高等教育：招生市场的马太效应

Yoshiaki Obara

日本玉川大学 (Tamagawa University) 校长

电子邮箱: obaray@tamagawa.ac.jp

在这个全球经济紧缩、日本经济复苏无望的新时期，日本常常出现有关社会被分化成“成功者群体”和“失败者群体”的讨论。当糟糕的经济状况威胁到了一个组织——尤其是大型组织时，日本政府总是会公开或不公开地采取干预措施。因为担心大型组织倒闭而引发的连锁反应，即使这些组织的庞大规模并不能保证将来能取得“成功”，日本政府仍会采取行动帮助这些组织度过难关。和其他组织一样，许多日本私立高校就面临着掉入“失败者群体”的危险。

私立高等教育的分化

这一现象的出现，部分在于日本大学管理层的集体短视，未对传统的大学适龄人口的减少做好预案。在日本，传统的大学适龄人口以外的人选择进入或重返高校接受高等教育是不常见的，部分原因在于学生接受完延迟或额外的教育后很难找到全职工作。因此，日本的高等教育市场主要由传统的适龄学生组成。虽然自1994年起，适龄人口开始减少，但日本的高校仍在不断扩张，还有许多新的高校开办。结果，许多高校，尤其是偏远地区的高校和小型高校招不到足够的学生。

定员

“定员”(tei-in)这个术语是指某所大学在文部省登记在册的入学新生配额数。当一个新的学院或学系成立时，其招生配额数根据文部省制定的认证标准来确定。高校通常会招收不超过配额30%的新生，这样就能获得政府指定的补贴。政府的补贴旨在帮助私

立高校保持适当的师生比。过去，一些面临财政困难的高校试图通过扩大招生规模但不同时增加教师数来摆脱困境。根据配额规定来招收新生是每所大学的责任。

但是，招收超过配额数规定的学生能获得预算外收入。比如，一所一年级新生配额为5,000的大学多招收了20%的学生，每年则可以额外获得1,200万美元的学费收入。这个数字是通过将额外学生数1,000乘以2009~2010学年日本四年制私立高校的平均学费1.2万美元计算而得。如果该高校四年都保持20%的增长率，那么就能得到一大笔预算外收入，有助于保证学校财政状况运行良好。

根据文部省公布的统计数据，日本规模最大的前20所大学的一年级新生配额总共是117,494，但实际上其中大部分都招收了超过配额10%~20%的学生。这些高校绝大多数位于东京、京都或大阪这样的大都市。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所大学，其配额为14,180。如果这所大学招收的一年级新生比配额多20%，那么就会有許多小型高校被赶出高等教育市场。41所高校(占有私立高校的7%)的配额数在2,500以上，而它们却招收了858,222个学生(占私立高校学生总数的42%)。占私立院校18%的一小部分高校招收了63%的学生。

当前存在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申请高校的高中毕业生纷纷流向大都市地区，这使得小型高校和位于偏远地区的高校更难以招到学生。对这些院校来说更为糟糕的是，顶尖的20所大学不但提供大量的奖学金，而且还实行“学费倾销”(dump tuition)。“学费

倾销”是和航空公司销售折扣极低的机票类类似的行为，因为这总比让航班空着座位要好得多。这使位于市区的大型高校比位于郊区的小型高校更有优势。

私立高校应该为不能招满学生、用足配额的窘境承担责任。私立高校协会（Association of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应当更早地让扩招政策刹车，但事实上却未能做到。18岁年龄组的人数（“a”）在缩减，因此某所特定高校的招生配额（“x”）和其他高校的招生配额（“y”）也应该随之减少（事实上没有），以保持平衡。如果高校能够按照公式“ $x+y=a$ ”来行事，那么他们就会意识到扩招政策无疑等同于破产。

根据文部省的进一步统计数据，大约43%的私立高校在2008~2009学年度未能招满配额数所规定的学生，47%的私立高校在2007~2008财政年度处于负债状态。这些高校大多数是位于偏远地区的小型高校。学费是许多高校的主要收入来源，占总收入的80%。未能招满学生的高校不但会失去财政资源，而且如果招生数低于配额的70%，还会失去政府补贴。如果这些高校不能按照“定员”招满学生、用足配额，那么它们就会挣扎于防止储备基金枯竭的困境中。

是私立高校的财政负担还是资产？

私立学校会计法规定，私立高校必须留有一定量的资金作为基本储备基金。储备基金包括全职教师退休收入的50%或100%，以及新设施的折旧费用（根据规定的公式计算）。如果有建造新大楼的明确计划，则需要腾出一笔钱划入储备基金。

每所高校的基本储备基金因其规模和是否有购买新设施或扩建校园的中期计划而不同。当银行利率在3%~5%时，许多高校会

把储备基金存入银行账户，以获得资产收入。由于目前银行利率降至0.5%，许多高校会选择通过政府债券、结构性债券（structured bond）、外汇存款或者金融债券进行资产管理。与信托投资、产权投资或者衍生品交易相比，这些投资的风险较低。

比如说化名为K的某大学（“定员”为5,500个学生），媒体报道该校在从衍生品交易中撤出储备基金前，已经浮亏了1.5亿美元。该大学不得不用银行贷款来弥补其损失。许多高校为建造新大楼向银行贷款。另外一个案例则是另外一种情况。T大学（“定员”为1,700个学生）未将其储备基金投入到高风险高回报的金融衍生品中，而是用结构性债券、金融债券和外汇信托来经营自己的资产，结果它在2008年的投资回报率为2.69%，获利1,500万美元。不过，该高校2009年的资产管理预期利润率将降为1.25%，预期获利700万美元。

很明显，小型高校或位于偏远地区的高校会因为学费收入越来越少而倒闭。这会导致提供给优秀学生的奖学金减少。此外，这些高校对潜在学生的吸引力降低，具体表现为申请人数减少、更有可能出现实际入学人数低于“定员”。小型高校或位于偏远地区的高校会因此陷入恶性循环之中，可能招收不到有潜质的学生。这一趋势反过来加大了大型高校或大都市高校可资利用的机会。可以预见到日本的高校将来会出现分化：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如果没有迹象显示政府会给予小型高校或位于偏远地区高校额外的援助，其中一些（具体数字未知）将可能会被逐出高等教育市场。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面对这铁一般的事实。大型高校将幸存于变动的环境中。

德国：对世界一流大学的追求

Barbara M. Kehm

德国卡塞尔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

电子邮箱: kehm@incher.uni-kassel.de

尽管全球排名遭到广泛的批评，但对于许多国家来说，至少让一所大学进入世界顶尖大学之列具有政治上的吸引力，事关国家声誉。以高等教育机构多元化和法律上的同质性而闻名的德国，也有同样的行动。2004年，德国联邦教育与科研部的部长提议确定德国的一流高校。这位部长指出，为确保德国在新兴知识社会中的竞争力和经济前景，提高德国大学质量高、科研领先的国际知名度，“我们需要灯塔”。

这个想法孕育了德国的“卓越计划”。在与政治和经济上负责高等教育的德国政府进行了复杂的协商之后，卓越计划确立了三个竞争领域：研究生院、各种合作者在跨学科团队里开展战略性研究的卓越集群、旨在建成一流大学的大学发展构想。每个领域都会连续五年获得一笔相当数量的额外经费。整个计划的遴选过程十分复杂和耗时，最终有9所大学在大学发展构想的竞争中胜出，成为未来的精英大学。

卓越计划不仅加剧了德国大学之间的竞争，而且也标志着德国有意识地将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进行更垂直的分化。

批判性的分析

上述竞争及其后果带来了两大影响。首先，德国所有大学基本平等的长期假设在竞争过程中被放弃了。其次，那些参与竞争但未被选中的大学和因成功机会很小而未参选的大学，现在感觉成了“二流”，甚至是失败者。产生这样的态度并不奇怪，因为人们没有对其他形式和种类的卓越进行理性思考，只认为科研值得支持和奖励。然而，未受到

卓越计划资助的大学仍然发挥着培养人才的重要作用，一流大学最后可能会从这些人才中招募学生和学术人员。因此必须激励这些大学致力于人才培养。

我们能从卓越计划中的趋势及其影响学到什么呢？从更全面的角度来讲，至少有八个关键问题值得注意：

首先，基于政治上对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和创新体系竞争力的预测，卓越计划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些仅仅与声誉有关。

其次，项目的遴选过程没有区分已有业绩和潜在业绩，因此影响了遴选和奖励决定的有效性。

再次，公开承认德国大学之间存在差异的做法，废除了长期以来认为高校相对同质（在质量上）的假定。但是，遴选的过程只关注科研，教学卓越的重要性被降至二等地位。

第四，业绩压力被从中央管理机构转移到了基层单位，这种做法容易让基层单位进行风险规避。但是，避免非正统的“冒险性”研究，可能恰恰不利于创新和尖端研究。

第五，在卓越计划实施之初，人们并没有决定该计划应该是一次性的，还是未来重复进行的。一次性的建设能否真正起到催化作用，促使受资助的大学达到临界状态，从而在五年之后能够不受外力的帮助继续发展下去，目前尚不明确。

第六，卓越计划存在一个严重的政治疏忽，那就是未考虑该计划对德国高等教育系统整体布局和未入选高校的影响。额外的资助是只会给“灯塔”本身（及其他领域的胜者）带来更好的业绩，还是会给整个高等教

育系统带来更好的业绩，尚需今后定夺。

第七，“卓越”这个词的意义已经高度膨胀，广泛地被用于招标书和投标书中。然而，自称的卓越不能被误认为真正的卓越。

最后，卓越计划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声誉分配的过程。然而，声誉是一种抽象的地位或由社会赋予的，不再能够根据学术和科学标准，以实际业绩为基础，采用同行评议这一传统方式对之进行客观地测量和评价。

利与弊

从宏观上讲，通过排名或其他种类的竞争来确定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是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进行市场调节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不仅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主要的调节员，允许排名成为发展的推动者，也可能造成高校之间的有害竞争，进而威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平衡。

大学排名和其他确定“最好大学”的竞争，可以作为表征高校特点的一种形式。但是，对声望和地位的竞赛很容易导致模仿性的同质化，即其他所有高校都模仿“最好的大学”。因此，这样的发展不再专注于单所高校自身的优势，最终将会导致高校特征更不突出，并使整个高等教育的效用遭到质疑。

众所周知，没有哪所大学在各方面都“卓越”。对于某个高等教育系统中哪些高校最好，各国和国际上也有大量的默会知识。是否还需要用方法常常受到质疑的排名或世界一流大学的鉴别来重现这些知识，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早在1983年，伯顿·克拉克就强调大学创造的知识具有境域性、整合性和文化嵌入性。其测量并非易事。

回应《进一步探析经合组织的高等教育统计数据》一文

Eric Charbonnier

经合组织教育理事会分析师

电子邮箱: Eric.CHARBONNIER@oecd.org

《各国教育概观》是参加经合组织教育系统指标项目 (Indicators of Education Systems program) 的经合组织成员国政府、专家和学校长期合作的年度报告。该报告包括大约 30 个指标和 100 多张图表, 也就是说, 每年包括 25,000 多个经过严格核实的数据。

指标的选取依据是其凝聚性 (cohesiveness), 即它们共同反映连贯的情况、分析趋势以及政府在今后面临的挑战。为了给出普遍的定义和各国需要遵守的统一方法, 还考虑了文化差异和各国教育系统的独有特征。如果最后的数据未考虑这些技术标准, 将会被参与国或者经合组织从报告中剔除。

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 但指标的质量总还是可以提高的, 而国别数据收集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是很好的一个措施。《进一步探析经合组织的高等教育统计数据》的作者亚瑟·豪普特曼 (Arthur Hauptman) 在其文中表达了对我们计算和汇报指标方法的关注, 其中一些评论值得进一步商榷。

留学生和入学率

一些国家高比例的留学生的确对指标有所影响, 尤其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其留学生占整个高等教育在校生的比例超过 15%。然而, 即便在计算中剔除留学生 (下一期的《各国教育概观》计划这样做, 将会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 这两个国家在高等教育毕业率这一指标上的排名依然不变。

豪普特曼对入学率 (enrollment rates) 计算方法的描述并不准确。我们使用的是净入学率, 即用各级教育中在读的某一年龄 (段)

学生人数除以该年龄 (段) 的人口数。数据以年龄段 (例如, 20~29 岁在校生数占 20~29 岁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而不是以教育水平的形式呈现。此外, 在计算该比例时, 分子与分母中都包括留学生。唯一可能造成数据倾斜的情况是, 学生在一个国家居住却在另一个国家学习, 这样可能会被算入居住国的人口数据。卢森堡就是这样, 在那里居住的大多数学生都在邻国 (比如德国、比利时和法国) 的高校里学习。

用于解释结果的指标

大学的毕业率和完成率存在差别并不一定是反常现象, 因为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通常会影响到完成情况。日本就是这样的例子。在日本, 仅有 45% 的年轻人上大学, 而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入学率是 56%。但高完成率 (超过 90%) 弥补了低入学率, 因此日本的毕业率能够达到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我们确实需要仔细审查来自劳动力调查的数据和高校提供的数据, 以确保两种数据的一致性, 尤其当两个调查中都涉及到高等教育的分类时。但是, 由于数据的覆盖面不同, 加拿大的大学毕业生数低于根据 25~34 岁人口总数计算出的教育水平。如果只考虑大学的情况, 加拿大的指标就接近经合组织两类指标的平均水平。

民间经费和研发经费

美国用于高等教育的经费较高, 主要是因为美国高校的学费和获得的捐赠高于经合组织其他成员国, 而大学附属医院的影响相对较少, 因为统计时只计算了医学专业学生

的教育经费和教学医院的研发经费。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智利、以色列、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在内的其他国家，与美国的情况相似，民间经费超过高等教育总经费的40%。民间经费增加了大学可获得的资源，因此在指标中予以考虑也合乎情理，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很多大学都面临资源增长困难的时期。

用于研发活动的经费确实影响了各国在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方面的排名。在德国、荷兰、挪威、瑞典和瑞士，研发经费占全部教育经费的40%以上。但是，《各国教育概观》给出了两类指标，其中一类包括研发经费，而另外一类为了只体现教育核心服务的成果，将研发经费排除在外。

标准相似，结果未必相似

每个国家的规模、富裕程度和人口组成都存有差异，所以在解释结果和实施改革时，应考虑这些差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能对经合组织成员国进行比较。情况看似相近的国家，其表现上的差异非常明显。经合组织的留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的结果显示，在移民人数众多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有移民背景（而不是本国背景）的15岁学生的成绩存在明显差别。比如在加拿大和瑞典，15岁的第二代移民的理科成绩好于第一代移民的成绩。然而在德国，第二代移民的成绩退步巨大，因此促使德国政府最近开始进行

教育改革。

扩展教育系统的投资策略

本文对高等教育数据计算方法的澄清，不应该掩盖《各国教育概观》中提到的主要趋势。正如该报告所言，经合组织成员国今后面临的最重要挑战将是在为高校学生提供各种公共补贴的同时，找到公共和民间经费之间的平衡。一些国家已经成功地找到了新的民间经费来源，也有一些国家增加了其公共经费。未采用上述做法的国家在协调发展公平与质量时，正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无论现在还是将来，这个挑战都值得注意，因为正如过去20年间公布的数据所示，高等教育正在飞速扩张。扩张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高水平工作的数量几乎在所有国家都高于潜在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二是高等教育学历给个人带来的收益，比如高薪和工作前景。当然，有些国家在未来的十年里甚至面临没有人力来替换退休人员的困难。

在未来的若干年，高等教育一定会继续发展。每个国家都需要在保持高等教育质量和机会平等的同时，采取大量措施应对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由于目前的经济状况妨碍了高等教育的资金筹集，高等教育发展的压力将会更大。国际比较通过描述和分析不同政策制定者所实施的不同政策的有效性，将继续推动公共讨论。

新书简介

Agarwal, Pawan. *Indian Higher Education: Envisioning the Future.* New Delhi, India: Sage, 2009. 488 pp. Rs. 895 (hb). Web site: www.sagepublications.com. ISBN 978-81-7829-941-9.

作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有关印度高等教育最全面、最有深刻见解的一本书，该书聚焦于印度这一全球第三大高等教育系统的整体结构和扩张等重要问题，讨论的主题包括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入学机会与公平、质量管理、科研的作用等。作者提供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并对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

Banta, Trudy W, Elizabeth A. Jones, and Karen E. Black. *Designing Effective Assessment: Principles and Profiles of Good Practi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9. 338 pp. (pb). ISBN 978-0-470-39334-5.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以美国对其高等教育结果的评价实践为研究重点，该书进行了专题讨论并提供了一些案例研究。讨论的主题包括通识教育、本科专业、教工的发展、专业评估、教育技术的运用、学生事务、社区学院和研究生教育。

Bhandari, Rajika, and Shepherd Laughlin, eds.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Move: New Developments in Global Mobility.*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8. 130 pp. \$24.95 (pb). ISBN 978-0-87206-315-0. Web site: www.iiebooks.org.

该书全面概述了影响全球人才流动的关键因素，讨论了学者的流动及其影响、全球学生流动、各国和地区的科技竞争力、排名对寻找英才的影响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与人才流动。

Finkin, Matthew W., and Robert C. Post. *For the Common Good: Principles of American Academic Freedom.*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3 pp. (hb). ISBN 978-0-300-14354-6. Web site: www.yalebooks.com.

在该书中，两位著名的美国法律学者对美国学术自由的传统和定义进行了深入讨论，细致分析了目前的趋势和问题。其关注的主要问题包括：教学的自由，课堂和大学内的言论自由，研究和出版的自由，以及在大学之外的言论自由。该书在最后讨论了职业责任，因其与学术自由有关。

Kelshaw, Todd, Freyda Lazarus, and Judy Minier, eds. *Partnerships for Service-Learning: Impacts on Communities and Student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9. 295 pp. \$40 (hb). ISBN 978-0-470-45057-4.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服务性学习（service learning），即让学生参与与校内学习有关的校外服务性活动，目前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服务性学习如何在全美多种专业开展的问题，该书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

Laughlin, Shepherd, ed.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Perspectives on a Growing Partnership.* New York: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2008. 114 pp. \$24.95 (pb). ISBN 978-0-87206-308-2. Web site: www.iiebooks.org.

约1万名美国学生正在中国学习，约7万名中国学生和1万名中国学者正在美国学习。过去的20年里，中美两国在教育上的联系得到了巨大发展。该书审视了中美高等教育关系的若干方面，包括政府和学校的政策、学生交换项目、语言问题、教师交换等问题。

Mohrman, Kathryn, Jian Shi, Sharon E. Feinblatt, and King W. Chow, eds. *Public Universiti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Chengdu, China: Sichu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356 pp. \$38 (pb). Web site: www.scupress.com.cn. ISBN 978-7-5614-4246-3.

该书对大学如何能够促进区域发展进行了案例研究,包括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市内校区与凤凰市的发展、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区域聚焦、中国南京大学与江苏省的发展以及学生参与社区发展等。

Morphew, Christopher C., and Peter D. Eckel, eds. *Privatiz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Perspectives from Across the Academ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4 pp. \$45 (hb).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ISBN 978-0-8018-9164-9.

在美国公立高等教育面临严重财政问题的现实背景下,该书研究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私有化趋势日盛的问题。讨论的主题包括私有化的政治经济问题、私有化大学的治理、私有化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其他公共机构的经验教训,以及欧洲高等教育私有化的趋势。虽然该书的研究重点是美国,但对于其他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有借鉴意义。

Neumann, Anna. *Professing to Learn: Creating Tenured Lives and Careers in the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306 pp. \$45 (hb). ISBN 978-0-8018-9131-1.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在访谈的基础上,该书对美国研究型大学中获得终身教职的新一代教师的生活进行了研究。在许多方面,这些教授是研究型大学的核心,因为他们是积极从事科研的生力军。尽管研究型大学只占美国高等教育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该书对教授如何规划其职业生涯、怎样看待教学与科研、如何与同事开展合作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该书聚焦于美国,但对世界其他

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也具有借鉴意义。

Oanda, Ibrahim Ogachi, Fatuma N. Chege, and Daniel M. Wesonga. *Privatization and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 Kenya: Implications for Access, Equity, and Knowledge Production.* Dakar, Senegal, CODESRIA, 2008. 108 pp. (pb). Web site: www.codesria.org. ISBN 978-286978-218-7.

该书对私立高等教育日渐壮大所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分析,尤其是对入学机会和公平的影响。作者指出,私立高等教育扩大了高等教育的容量,但几乎不关注入学机会和公平问题。该书还讨论了私立高等教育如何可能对知识生产产生影响。

Savicki, Victor. *Developing Intercultural Competence and Transformation.* Sterling, VA: Stylus, 2009. 375 pp. \$29.95 (pb). Web site: www.Stylyuspub.com. ISBN 978-1-57922-266-6.

该书作者从美国人的视角出发,讨论了留学生生活中的跨文化问题。作者的关注点是帮助学生理解其他文化,将其看成是留学经历的一部分。书中既讨论了跨文化问题与特定国家和高校如何相关的案例,也讨论了情感教育、跨文化能力、整合经历与体会等更广泛的问题。

Van Vught, Frans A. *Mapping the Higher Education Landscape: Towards a European Classifi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170 pp. €99.95. (hb). ISBN 978-90-481-2248-6.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欧盟正在资助对欧洲高校和专业进行分类的努力。该书讨论了在理解欧洲各国学术体系多样性时遇到的一些复杂问题,以及创建一个适当分类的困难。由于博洛尼亚进程带来的改变,人们已经认识到欧洲各国学术体系的巨大差异。书中讨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欧洲研究区域(European Research Area)、分类体系的设计以及排名与分类等。

Raby, Rosalind Latiner, and Edward J. Valeau, eds. *Community College Models: Globaliz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629 pp. Euro 229 (hb). ISBN 978-1-4020-9476-7.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该书用 33 章的内容讨论了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区学院,既包括国家个案研究,也包括主题讨论。书中有若干章聚焦于社区学院在美国的界定,即提供职业资格教育的两年制高校。全书关注的是社区学院的理念如何在全世界蔓延,对中国台湾、伊朗、津巴布韦、越南等许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研究。

Richardson, Richard, Jr., and Mario Martinez. *Policy and Performance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An Examination of Cases Across State System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9. 264 pp. (hb). ISBN 978-0-8018-9161-8. Web site: www.press.jhu.edu.

通过研究美国 5 个州的情况,该书分析了各州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方式。个案研究显示,政策实施通常是有问题且滞后的。书中对经费安排、信息提供、交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Smart, John C., ed. *Higher Educatio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23.* Dordrecht,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8. 390 pp. \$179 (hb). ISBN 978-1-4020-6958-1. Web site: www.springer.com.

高等教育研究年度手册依旧是对目前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研究最有用的汇编之一,该书是第 23 卷。与前一卷一样,书中主要聚焦于美国的研究,对许多不同的主题进行了探讨。各章对相关研究和分析进行了概述。重点研究的问题包括高等教育的经济模型与

政策分析、欧洲对大学排名和分类的看法、科学和工程学领域的女教师、经济资助和学生辍学等。

Stephens, David, ed. *Higher Edu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Twenty-Five Years of Higher Education Links.* Oxford, UK: Symposium Books, 2009. 240 pp. £28 (pb). ISBN 978-1-873927-22-9. Web site: www.symposium-books.co.uk.

该书重点研究了国际发展合作在若干领域和国家的作用。讨论的主题包括促进教育研究、改善卫生条件、性别问题等,对中国、非洲等国家进行了个案研究。

Sun, Jeffrey C., and Benjamin Baez. *Intellectual Proper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Knowledge as Commodity and Its Legal Implications for Higher Educa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9. 151 pp. (pb). ISBN 978-0-4704-7900-1. Web site: www.josseybass.com.

虽然该书研究的是美国的问题,但对于其他国家也很有用,因为都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书中主要关注的是版权和专利,并在高等教育的背景下讨论了这些问题。

Tight, Malcolm, Ka Ho Mok, Jeroen Huisman, and Christopher C. Morphew, eds.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Higher Education.* 525 pp. \$200 (hb) ISBN 978-0-415-43264-1. Web site: www.routledge.com.

该书收录了 36 篇论文,对高等教育中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讨论,而不是提供全面探讨。讨论的问题包括教与学、课程设计、学生体验、质量、高等教育政策、大学管理、学术工作以及学问。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介

为了加快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进程，上海交通大学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在原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直属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简称高教院)。高教院下设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中心以及《国际高等教育》编辑部。

高教院坚持以实证和定量研究为特色，以"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为标志，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以教育部科技委《专家建议》为标志，在政府咨询方面已经产生广泛的国内影响。

以小规模、创新型、国际化的世界知名人才培养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培养高等教育学、科学与技术管理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在校硕士生、博士生和在站博士后总人数的规划目标为 80 名，且大部分博士生有出国访学经历，留学生比例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以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世界知名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为目标，高教院致力于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学术研究团队，有选择地追求卓越，在世界一流大学研究、研究生教育研究、定量科学与技术政策研究等领域打造国际学术品牌。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GSE),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in 2007. GSE aspires to the highest standards of scholarly and professional practice, emphasizes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and focuses on applied research, policy studies and consultation.

GSE builds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of the former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which was established in 1985. The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ARWU)", which was first published in 2003 and updated annually, has gained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Consultation reports on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science policies, which are provided to Chinese governments on a regular basis, have attracted national attention.

GSE focuses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pecifically on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context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t has three research groups, namely the Center for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The centers will have world-class research teams, leading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a highly internationalized student body.

GSE will uphold the best academic values—a commitment to academic freedom and original inquiry, service to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China and beyond, and provide the best possible education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Guoji Gaodeng Jiaoyu

(Translated from Number 57, Fall 2009,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Boston College)

Academic Freedom

Academic Freedom: A Realistic Appraisal	101
New Challen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03
Crossroa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05

International Issues

Is Greater Financial Independence Ahead for Universities?	107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for Increasing Attainment.....	109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ization

Unintended Effects of the Bologna Reforms	111
Globalization, Universities and Quality Assurance in Panama.....	113
Canadian Strategies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115

Africa Focus

Postgraduate Studies in Africa: The Looming Crisis	116
Burundi: Challenges and Conflicts	118

Countries and Regions

Japan: The “Haves” are Gaining and the “Have-Nots” are Losing.....	120
Germany: The Quest for World Class	122

A Response

A Closer Look at OECD Statistics	124
--	-----

New Publications	126
-------------------------------	-----